

管仲荀况桑弘羊
刘晏王安石的
理财思想



F092.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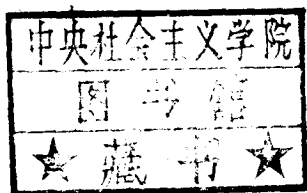


200168996

D448/11 53363

管仲、荀况、桑弘羊、 刘晏、王安石的理财思想

凌大珽 马大英
王子英 陈昭桐 著
何立峰 吕调阳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管仲、荀况、桑弘羊、
刘晏、王安石的理财思想**

凌大琰 马大英

王子英 陈昭桐 著

何立峰 吕调阳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保定地区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146,000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保定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

统一书号：4166·436 定价：0.75元

出版说明

财政，在封建社会有些朝代称为度支，是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群众的主要工具之一。在我国几千年阶级统治的历史中，历代统治阶级向广大人民群众敛索无度，予取予求，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斑斑史实，在历代财政工作中得到深刻的反映。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些新生的统治阶级的上升时期，确也出现过一些促进生产发展，使人民生活比较安定的各项财政政策的记载，从中也产生了一些善于经纪辟划，能采取比较有远见的财政措施，辅佐比较开明的一代帝王，建立巩固的政治体制，使人民暂时得到休养生息，从而对后世产生显著影响的理财家或政治家；尽管这些理财家或政治家往往遭到当时顽固派的反对，他们的政绩维持不了多久。这些不同时代的理财家或政治家在当时来说，一般都具有比较先进的财政经济思想，根据他们财政经济思想倡导的各项财政经济措施，对推动各该朝代的生产发展和社会安定确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得到多数人民的拥护，各朝代的史家也多予以重视和肯定。因此，了解这些理财家的生平史实，有助于我们理解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各个朝代的历史背景，我国财政史的演变，财政制度的内容，以及当时生产发展情况和人民生活情况，从而便于研究我国财政经济的历史

的经验教训，起到“鉴古知今”的作用。

我们编纂本书的目的就是为有兴趣于研究财政史的读者提供这些理财家从事财政活动的基本史实和知识。

本书选择了五位理财家的简介，包括春秋时期的管仲，战国后期的荀卿，西汉的桑弘羊，中唐的刘晏和北宋的王安石。这五人都是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对后世影响较大。

这五篇都比较短小，简明易读。由几位同志分别撰写，因此体例结构和观点也有所不同。每一篇除了叙述各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以外，作者并作简要的评述和分析。限于编辑水平，编纂如有不当之处，希望读者批评并提供意见。

一九八二年十月

目 录

管仲的财政经济思想	凌大斌 (1)
一、管仲和《管子》	(1)
二、《管子》的经济思想	(3)
三、《管子》的财政思想	(19)
四、《管子》财经思想的实质	(32)
荀况的经济与财政思想	马大英 (38)
一、荀子生平简介	(38)
二、欲望论	(39)
三、私有论	(45)
四、生产论	(50)
五、流通论	(65)
六、开源节流论	(68)
七、国防经济论	(80)
八、三个特点	(91)
西汉时代杰出的理财家桑弘羊	王子英 (94)
一、前言	(94)
二、桑弘羊生活的时代	(96)
三、桑弘羊的生平	(108)
四、桑弘羊制订和推行的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与 措施	(122)

五、桑弘羊的财政经济思想	(144)
六、历代对桑弘羊的评价	(164)
唐代杰出的理财家刘晏	陈昭桐、何立峰(168)
一、刘晏的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	(168)
二、刘晏的财政思想	(172)
三、刘晏的理财活动	(178)
四、刘晏理财成功的原因及其影响	(187)
王安石的理财思想	吕调阳(196)
一、王安石财政思想的形成	(196)
二、王安石财政改革斗争中实施的新政	(198)
三、王安石财政改革斗争中的历史实际	(201)
四、王安石财政思想的特征	(206)
五、结束语	(221)

管仲的财政经济思想

凌大琨

一、管仲和《管子》

管仲，是春秋时代的大政治家。他相齐桓公四十余年，把一个积弱的齐国治理成为国富兵强。以区区之齐，代周王朝统率诸侯，称为霸主，历史上的五霸之首。孔子也称赞他“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的业绩，为历代所称道。

管仲，名夷吾，字敬仲，颖上人。生年不详，卒于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他出身贫苦，做过小商人，据《史记·管晏列传》记载：他“少年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管仲曰：‘吾始困时，常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常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常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可知管仲出身贫贱，谋事三次，三次见逐于君，最后得事公子纠。而后来公子纠被杀，管仲则幽囚受辱，几至杀身，可称得半生坎坷。如果没有鲍叔这样贤德有政治远见的知己，不仅不嫌弃他，反而以贤能进于桓公，并以身下

之；如果没有桓公那样采纳贤谏赤诚信任，待以“仲父”，管仲这样大政治家的才华，就会被湮没了。鲍叔这样为国家为朋友，不争权，不争功、豁达大度的贤臣，实在千古难得；而桓公知人善任，信而不衰，不怕擅权，四十多年对管仲言听计从，终成为五霸之主的事业。管仲就是在这样左辅右弼，知友贤君协力下，不负热望地发挥了他治国的才能的。

管仲任齐相后，以区区之齐远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他以“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下令如流水源，令顺民心”（《牧民篇》）的思想治齐。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财政、经济国策和措施，影响当时和后代是很久远的。

《管子》是一部财政经济思想占主导的书，并非管仲所著。成书当在战国后期，有些篇章甚至延后到汉代中后期。内容丰富而论点复杂，传说是管仲弟子或其属下记述他治齐的业绩的。这当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大部分可能是管仲的思想而为他人所追述，也有一部分是后人的思想，可能和管仲思想有近似处，也收在《管子》书中。过去学者认为《管子》书中，伪造很多，我以为即使到秦汉时代，也离管仲的时代不远，他的言论思想流传于后人的也必不少，即使以他们的著作附于《管子》，也是因为和管仲的思想相近似。所以我以《管子》的财政经济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思想体系，没有分篇各论。

《管子》夙称难解。历代传下来的版本脱落错字很多，解释的人也各有见地，有些至今还解释不了，我只是按大多数的解释法来解释。

二、《管子》的经济思想

《管子》一书，蕴藏着卓越的思想，尤其在财政经济方面，非常丰富，在我国封建社会还是少见的。它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论者。它认为生产发达了，物资丰富了，才能使政治上轨道。它说，掌握政权的人，要注意农业生产，储备粮食。国家富足了，四方的人就来投奔；土地开辟了，人民不致流散；人民生活安定了，才可以谈到礼义；生活富裕了，才可以讲到荣辱。“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廩。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篇》）。这番话，明确表达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它认为一国之治乱，不在于抽象的礼义廉耻，而在于国计民生。它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治国篇》），又说掌握原则治国，国家就能安定，掌握粮食就富足，种桑麻发展牧畜业人民就富；法令顺于人心，政治就便于推行。“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牧民篇》）。它又对比两种不同的经济基础造成不同的政治局面：凡是贤能的政治家要作到城乡富足，政治就上轨道；人人为公而不为私；国库充实，人不犯法；正直的风气压倒邪恶的风气。反之，农村荒芜，城市空虚；执政者凶残，政府混乱；公法不行，私下活动；国库亏空而监狱里人满；正气被邪气所压倒。“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

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廩实而图圉空，贤人进而奸民退。……不能为政者，田畴荒而国邑虚；朝廷凶而官府乱；公法废而私曲行，仓廩虚而图圉实，贤人退而奸民进”（《五辅篇》）。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管子》书中的经济思想主要有列三点：

（一）重农思想——土地、自然条件和农业劳动力的重要性

管仲的时代，领主经济已形瓦解，封建经济正在发展，过去的奴隶有一部分获得了土地，生产关系的变革，改变了过去的分配关系，奴隶不是一年到头收不到自己劳动的成果，而是除了交给地主的产品之外，自己还保有一部分，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这样，他们也就体会到土地和劳力结合起来是自己生活的来源，因此，此时期人们思想中对农业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管子》的作者强调阐述了这一思想。

它认为农业（包括林、牧和其他副业）的基本要素关系到三方面：一是土地，二是自然条件，三是农业劳动力。

（1）土地 《管子》书里说，万物生长于土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地篇》）。又说土地是政之本也，土地可以决定政治，土地问题得不到解决，政治也就不能上轨道；政治不上轨道，任何事情也做不好。“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乘马篇》）。

《管子》所指的是土地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固然也有理由，如果理解它讲的是土地所有制，也不无根据。因

为管仲和其同时代的作者，看到领主制的土地关系造成奴隶反抗起义所引起政治经济上的混乱，而进入封建土地所有制时，出现了相对的稳定局面，所以提出“地者，政之本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的主张，在当时也是正确的。

（2）自然条件 《管子》书中，也讲到农业和自然条件的关系，它认为天时和地利也是决定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它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廩不盈”（《牧民篇》）。但在当时，人们还无法改造天时。而地利的自然差异影响较大，所以《管子》书中对于不同性质的土地生产不同经济价值这一点相当重视。它说不能耕种的地，光秃秃的山，干涸的沼泽，不生长草木的地和荆棘杂生、人不能进入的地方，百亩等于良田一亩；能进去开采的林木，成材能作车轴的地区，九亩等于良田一亩；能下网捕鱼的地方，五亩当良田一亩；山上产大木，可以作棺材、作车的地区，五亩当良田一亩。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樊棘杂处，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藪（Sǒu 沼泽）镰缠（Chán 绞绊）得入焉，九而当一；蔓山，其木可以为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流水网罟（gǔ）得入焉，五而当一。”（《乘马篇》）

它如此分别土地等级的折合标准，也是为了它所主张的“均地分力”作个基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在以

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时期，气候风雨，土地山川，对于发展经济当然起主要作用。但是《管子》书中并不仅依赖自然条件，而主张积极地改造自然。它说扩大耕地面积，劝告人们勤于耕作、修建房屋，这是增加生产。挖掘经济潜力，运出仓库积存，修整道路，疏通关市，管理商旅，这是发展经济。清理水源，建筑水库，疏浚沟渠，清除水潦，这是讲求水利。

“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穡（sè 收获谷物），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滞积，修道路，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异水潦，利陂bēi（山坡）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五辅篇》）

以上这些措施即是改造自然条件，发挥人对自然的主观能动作用。

（3）农业劳动力 我国古代思想家，大多数是主张重农主义的，但他们一接触到农业，首先就联想到土地，而忽视劳动力，把劳动力与劳动对象的主次关系分不开。惟有《管子》一书特别强调劳动力的重要。它说“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八观篇》又说“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轻重甲篇》“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八观篇》）。在《国语·齐语》中有《管仲对齐桓公问》一段话，把农业劳动力对土地自然条件的关系说得很明白。它说：

“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来（lèi

翻土工具)、耜(sì 铲土工具)、枷(jiā 打谷工具)芟(shān 大镰),及寒,去藁(gǎo 枯草)除田,以待时耕;及耕,深耕而疾耰(yōu)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挾其枪、刈、耨(nōu) 耨(bō),以旦暮从事于田野。脱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襦(bō) 袂(shì),濡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敏,以从事于田野。”

这段话主要意思是农民根据四季的不同需要装备农具,天冷时除草,待春而耕,平整土地,等着下了雨,除草松土,起早贪黑地干活。下雨时披蓑衣戴笠帽,头上身上都溅上泥浆,抓紧四季时节来种植。

这说明纵然自然条件良好,而没有劳动力等于无用。这正说明了土地与劳动力的主从地位。它认为土地不过是劳动对象,而劳动力才是创造价值的因素。胡寄窗先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指出《管子》已走到正确的价值论的边缘,可惜它在此处停留下来,并未作更深入的探讨。我同意这个说法,也替《管子》作者在这里惋惜,如果当时能进一步阐发劳动创造价值的论点,那将是我国古代财经思想上多么光辉的一页!

(二) 国家积极管理调节国民经济

关于国家积极组织经济活动,是《管子》经济思想的特点之一。儒家和道家一贯主张不与民争利,不要干预人民的经济活动,放任自流。儒家比道家略积极一些,徘徊于“义”“利”之间,实质上是唯心、唯物两种思想时而交织,时而矛

盾。在矛盾不得解决时，只有主张精神生活来支配物质生活，所以归根到底是唯心主义者。儒家说“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篇》）。去了食以后，人民的生活都不管了，抽象的“信”能起什么作用？

《管子》和儒家道家不同，它认为国家要积极参加干预和调节人民经济生活，应该限制的必须限制，应该奖励的必须奖励；要诱导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生产，当然是重要的，即使生产了，而不知生产方法；甚至知道生产方法，但被自然条件所局限，不能和条件好的地方竞争，也不能和外国竞争，因此必须运用国家职能来管理调节它。它说：“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乘马篇》），又说：“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安排管理的意思）（《牧民篇》）。

《管子》主张国家强力管理经济。它说年成的好坏造成粮价的贵贱；经济管理的得失，影响物资的有无与物价的涨落。假定人君不会管理，商人们就要操纵市场，趁物资粮食紧张的时候，抬高物价。“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国蓄篇》）。它还说同样的土地同样的财富，能力强的人长于掌握运用，能力弱的人不能保守它的事业，如果国家权力不去管理国民经济调节盈虚，必然引致社会贫富悬殊愈来愈严重。“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佰人之功，愚者有不赙（geng，偿也）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国蓄篇》）

《管子》一书的思想，明显地是用行政力量来影响经济，但是客观上它并没有违背经济规律强行支配经济，这一点是管仲推行他的主张成功的原因。

在它所主张的国家干预人民经济生活的思想中，特别主张国家机构运用供求规律在商品领域中支配国民经济生活。

《管子》书中阐述了商品交换价值在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运用，它以此为基点，掌握商品交换价值的几种因素。它说“夫物多则贱、寡则贵”（《国蓄篇》），说明产量的多寡可以决定价格；“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国蓄篇》）；“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七臣七主》），说明年岁的丰歉，季节的影响也决定商品价格；“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国蓄篇》），说明税收对物价的作用；“散则轻，聚则重”（《国蓄篇》），说明放货与囤积也是物价贵贱因素之一。《管子》认识到上述因素，它主张国家应该创造条件运用上述几种因素来控制 and 调节商品价格，从而支配国民经济生活。

《管子》一书主张以货币、粮食、万物三个杠杆来控制国民经济。首先它以国家力量采矿铸币，以货币收购粮食和其它商品，贱时收进，贵时卖出。它说“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以币准谷”（《山至数篇》）。又引申说：国君掌管着人民的生计，治理着国家，调剂剩余产品来补救缺少的物资，所以人民没有不服从他的。五谷粮食有关人民生活，黄金货币为人民所通用，掌握了通用的钱币来调剂粮食，民力可以发挥出来了。

“故人君挟其食，守其国，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

而尽也。”（《国蓄篇》）

国家掌握了货币、粮食、万物，根据市场供求规律灵活地决定应付办法。它说丰收之年，粮价下降，牲口都可以吃粮食；凶年，粮价上涨，路有饥民，这难道是土地产量不足、吃的不够了吗？过去粮价下降，牲口吃粮食，浪费的结果，以致造成明年的不足。物价下降，出一半价格没有卖的，卖者就不够本钱。物价贵了加十百倍也得不到，人们没有东西用，难道是财物根本就少吗？那是在时间上和物资上管理的失调。所以善于此道的人，在物资有余和不足的时节加以调节管理：物资丰余时价格下落，国家用低价收进；在不足时涨价，国家就以高价卖出。

“岁适美，则市桀无予，而狗彘（zhi猪也）食人食；岁适凶，则市桀釜十镒，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桀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国蓄篇》）

《管子》一书还明确地指出运用货币、万物和粮食三个杠杆相互制约的推动经济活动的功能，就是国有储备，调剂民用之缓急，防止粮食的贵贱；国家用货币平衡物资和物价，尽量少用非经济手段（例如税收）取用民财。它说国君下令：高利贷者放债，以谷折成货币，偿还时也以货币。谷